

448

26 OCT 1934

世界論壇

第一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郵費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為限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發行者：

北平華市大街電話二四九號

印度的土地問題

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無疑地形成世界形勢底重要的一環。而印度在經濟上，人口上以及獨立運動上對於世界生活具有不小的作用，這篇文章以客觀的立場分析印度農民底痛苦，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底剝削，材料豐富，言論亦頗正確，印度將向那裏去，讀者不難于是文中求之。

全文太長，因分兩次登載。

編者

印度農民在英帝國主義者，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統治剝削之下，又受着本國手工藝被外國資本毀滅的影響以及城市商人的種種勒索，總之，被英國侵略者及其助手將農民的生機斷絕，農村現狀已陷入悲慘壓迫的痛苦深淵，他們和印度全國都在民族奴隸環境中過着痛苦日子，他們被英帝國資本的鐵腕壓着，英帝國主義者殘惡的勒收重稅，用低廉的價格將印度所產的原料轉運英國，以貪婪的利爪攫取印度一切的

目錄

印度的土地問題	劉其
美國預算制度與R.A.	范敦伯
顯微鏡下的德國政變	邢西澤
日本政黨之後退與官俗之前進	張友漁
修改凡爾賽和約與蘇聯的立場	柳真



財富，而又設各種方法，阻礙其工業的發達。使印度永遠屈爲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千百萬的印度勞苦羣衆的血汗都被英國資本變爲餘利，有了他們的助力，英國才能在這個無防守的滅亡的國家，維持牠的統治權。

英帝國主義者聯合印度農村中的殘酷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增強他們的勢力，鼓勵他們，利用他們進一步的把印度奴隸化。英帝國主義者在印度的直接擁護者，地主，高利貸者，和買辦的資本，幫助牠剝削印度。倘若印度農民能够自由耕種他的田地，而不做從地主租來的一小塊可憐的土地的農奴，倘若印度農民不肯被重稅和債務所窒息，那麼英帝國主義者將不能再使這個擁有三萬萬人民的大國，仍陷於無希望的奴役之中。同樣地，倘若不是依靠着英國侵略者的權力，牠們的銀行，和工業商業公司的力量，以及一切國家經濟各部門的統治，那末這些印度的地主高利貸者，也就不能長久把握着對印度農民的威權。

英帝國主義者已將印度從世界其餘的各國截斷，而妨害牠的自由發展。英國既已用武力，和欺騙滅了印度，英國的資本就攫取了印度的森林，和灌溉的源流（印度森林的一半，是屬政府的，墾地的四分之一是由政府所有的源泉灌溉的）又奪取了種植的最好的田地（佔有一百七十五萬畝，其出口的農產品差不多佔全國農產品出口物價的五分之一）又建立一種野蠻的苛稅制度，來劫掠印度農民，（英印政府所徵的土地等稅的收入，差不多佔全印稅收的十分之九，而這個數目，拿來供給英國軍隊官吏及稅吏的開支，相差只百分之二十五了）

在有些省區，英國征服者已建立一種制度，名 Zamindar

Zamindar 令地主負責納稅。在別的一些地方，他們又介紹一種制度，令農民在無定期的時間以內租賃田地，向政府直接納稅。此外，有多數的地方，他們又介紹一種聯合制度，使土地所有權依靠納稅及收獲才能存在。這種土地制度之所以不平衡的原因：第一，由於英帝國主義想利用印度的征服，來掠奪牠的土地和森林的財富，霸佔灌溉底設置及執行最無恥的租稅掠奪等權力。第二，由於英國征服者，將一部上層的封建王族中曾經反抗英國，而又不願放棄他們以前的權力和稅收者，一概斥革。第三，由於英帝國主義者意在增強本身權力，以便在各孤獨的封建集團及地主之間，或在農民與不完全服從英國的封建地主之間，發生衝突時，英國可成爲他們中間的最高裁判官，從中操縱。最後第四，由於英國征服者想執行他們的「分化印度而征服之」的根本政策，保存偏狹的官品等級，社會階級，及宗教和部落的利益，使其互相對立，彼此利害懸殊，自相衝突。此外這些土地制度之所以發生變動，更是由於英國資本之日益把印度轉變爲英國工業原料和食糧的供給者，而同時，更因此增加了印度上層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的勢力，甘心做英帝國主義侵略之擁護者和走狗，在留特瓦地方 (Votava) 農民貧困萬狀。首要的農戶，大都握有過分多的土地，他們大半的土地是用暴力，重利盤剝，和狡猾手段，攫奪了人家的，因此在該地產生這種土豪地主，時時不斷的剝削農民。另一方面苛捐重稅在該地時時不斷的毀滅農民，也幫助着攫奪農民耕種土地，使他們貧困。

英帝國主義掌握着印度主要的銀行。這些銀行指定盧比（按即印度銀幣名——譯者）的兌換率，逼迫印度人民用低價賣出，用高價買入。他們把持全印的現金積蓄，擁有鐵路輪

船的所有權，操縱一切，使印度農產品能够更容易的，更賤價的運到海港出口。印度人民感覺缺乏一切物品的痛苦，而不能向世界市場自由輸出輸入；即本國各省各縣之間，亦沒有無限制的商品交易的可能。印度內地貿易的買賣總額，大於對外貿易總額約十二倍，整個的商業制度，為英國資本的無數的經紀人，代理人所組成。從外國銀行到鄉村的 *Acharya, mahojahs, marwaris*, 等等，都在時常不倦的做着剝奪印度的必需品，減低生產品價格等項工作。沿着這些商務道路，百數萬碼的外國織物，大量的外國工業製造品，輸入印度，破壞民族工業，毀滅農民的幼稚手工業，英帝國主義已經確立了鹽和酒等等的專賣。每一撮食鹽都要徵稅。英國資本兇猛的監視印度，以致印度不能變成工業發達的國家。牠又擁有鐵產和生產工具等等之大工廠的所有權，牠要使印度沒有製造機器的大工業，任其狂亂的掙扎着。使印度大部保存原來農村的現狀，永遠為大英帝國的布爾喬亞和他們在海外的銀行，工廠，鐵產等企業家增加財富而努力工作。印度的輕工業頗有緩慢的進展，主要的是紡織工業，但這不過是給予在半飢餓狀態之下，不能免於死亡的小部分人以工作而已。

英印統治的意義，就是用野蠻式的壓迫長期的，有組織的，殘酷的掠奪印度農村，看不見的英國侵略者的手掌，貫穿印度各地連全國最僻遠的地角都侵到了。因為英國資本已經把千百萬的印度人生存的源泉，用暴力握在手中。他擁有全國的鐵產森林和主要灌溉企業的大權。最好的土地，已變成英國的耕田，園林與房產。印度農民沒有燃料與修補的木材。他們的牲畜因為缺乏營養而死亡，他們的田地因為灌溉不足而乾壞，他們在分散的小塊土地上，無希望的掙扎着，

既困累於稅吏之催賦，又磨難於地主及高利貸者之催租催債，勞動終日，尚不能免於飢餓，但是英國資本則從印度鐵產，森林，土地，水利等生產企業中，坐收千百萬盧比的利益。單祇就灌溉制度一項而論，投資所獲贏利每年即達總資本的百分之二十。

英國資本既已將印度分割成許多部分，又保護佔有全國面積五分之二之本地王公的存在。在這些土王區域內，農民絕對沒有什麼權利。他們不過像古時代的人民的被掠奪一樣的受着掠奪。那時的人民並不能被統治者以人看待，而在今日印度的農民，則正與那時的人民同一境遇，不過形式不像古時那樣露骨罷了。在英國軍隊，警察，官吏掩護之下，成千成百的農村，或整個縣區常被專門組織了來強迫納貢的搶劫的軍營所毀滅。英國「大人」(Sahib)按即印度人民對歐洲人的尊稱(譯者)及其奴僕走狗如法官地主警察等所說的話就是法律。而這法律就是打擊農民的巨掌。如果一個農田勞動者，或農民要進行耕種新的未開闢的土地，或到他鄉甚或到城鎮去工作，在英國資本監視之下的臣僕政府是決不准許他移去的，祇有英國資本自己所有的耕種地需要勞工時，才准於移動農村勞動者去工作。印度農村人口的被壓迫的羣衆，只能束縛在這不能養活他們的些少的土地上；因為英國貨物，已經在市場上，把印度農民的家庭和手工藝的製造品，淘汰幾盡。而城鎮的幼稚的工業，已被英國資本所搗碎，再難為全國千百萬不能生活的人民，謀得工作。每年印度每個農民，平均所獲的收入，還少於英國政府為監獄中每個囚犯所開支的數目。全印度形成一個大的英國監獄，而印度農村就成為監獄中用罪犯代替獄吏服役的最壞的土牢。

至少適於耕種土地的三分之二是屬於英帝國主義者和地主所有的，占印度農村人口七分之九以上的農民共祇擁有三分之一土地。在有些省縣(孟買Bombay, 孟加拉Bengal, 北瑪德拉斯North Madras, 中央及聯合省區, The central and United Provinces)大地皮的房產佔極大的面積，更加驅逐農民羣衆入於飢餓盲途中，而不能逃避，『Yamiodars』與『Ryotwars』區兩者之間漸次沒有差別。當此英國統治的時代，產生中間收租者的階梯，他們從別人手中租到土地，再把牠租出。這一羣各種不同的身份的寄生蟲，就在印度農民的身土寄養着。此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農民被帝國主義的統治所壓碎，被大地主及重利盤剝等所壓迫，他們不能找到自由耕種的土地，或尋得別種收入來源，照例農民是在共享收成條件之下，(‘Rai’或Share Cropping Conditions)從地主手中租到土地，至少交納收穫之半數給地主，但最普遍的習慣往往要交納三分之二或者更多於此數。有時地主借給農民種子和農具，其中大都除土地外，徵取收穫的大半。有時播種及耕種完全歸農民擔負。雖然如此，整個無地的貧農或稍有土地的小農都是依靠地主，高利貸者，及稅吏等的好惡而生存着。農民的土，分裂成小塊，而散處在各處；缺乏畜牧場，沒有森林權。水道及地位好的土地，都被地主及農村土地攫奪者所霸佔，農民極端的貧困及農民耕種設備的惡劣等等事實，都是引起勞苦農民和農田勞動者做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奴隸的原因。印度農村是強迫勞動的王國，不僅是在Orah地方，而且連貝哈爾(Bihar)奧理薩(Orissa)孟加拉(Bengal)以及其他省區等地都有一種所謂強迫農民服役的『貝加爾制度』(System of Begar)。許多地方，地主無論何時需要都可以有無代價的

，徵用他的佃農的勞役，耕牛，犁鉏，車輻等的權利。地主無論何時需要銀錢，都可以強索於農民。地主個人的地產(‘Sear’)常常由無自由的佃農耕種，佃農除耕種他所租的土地，與居住於他所購置的或建築的房屋以外，毫無權利可享。寄生蟲式的地主則擁有草地，森林中的野蜜，一切死於他的土地上的動物的皮毛，和護林木柴，等等的所有權。特別在內地各州，地主得向農民作各種的勒索。沒有土地和耕具的農民的地位近奴隸。貝哈爾，奧理薩等地的農民(‘Zamindar’)僅得到一個自由農業勞動者工資的三分之一的物品，做勞役報酬，他還要被迫而令其家人替地主工作，他見不到現錢，一生都不能還清他的債務。許多土著的部落，供給地主以農業勞動者，而這些勞動者所處的地位，是沒有自由處置自己的身體和財產的權利的農奴。

勞苦的農民，被地主，高利貸者和帝國主義者所掠奪，還要被迫去做許多無代價的服役。地主和英國官吏強迫這些悲慘的受壓迫的農民建築新路，修補舊路，建築和修補橋樑，清潔水池，鑿掘運河。這些農民的勞役耕牛工具無論如何的徵用，他們是決莫想得到任何一點代價的。農民又常被逼迫而無代價的供給官吏等的輸送。這些一切都是農民額外的負擔，倘若破敗的農民不能執行勞役和運輸的義務，他必重的被處苛重的罰金，有時還要被笞責鞭撻。

農民不僅交納地主以大半的收成，而帝國主義者且已授予地主向農民徵收各種財物的權利。

倘若地主家中舉行生日，喪事，喜慶等項儀禮，農民必須從他的收成中，支付儀禮的開支，地主往往更利用這種慣

例來強奪農民的財物。

當小農出售或抵押他自己的小小土地時，破產的農民有時被迫而交付賣價或押款的百分之二十五給地主，這些一切額外勒索的結果，即不算入勞役及運輸義務，農民往往已須支付了地主從他的小小農田中取去的收穫的一半。此外無限制的廣大的勒索，不過是另外的公開的劫奪而已。

一切宗教的牧師和教堂就是大地主。印度教的廟宇，他們巨大的財富及土地都是該寺廟創辦人的子孫的私有財產。回教及其他印度教宗派的所得款項，應該用作慈善和教育事業的開支，但是實際上，都入了僧徒們的私囊。耕種教會土地的農民，比地主的佃農的生活還苦。他們必須供給蔬菜，油，食物以及勞動力，為寺廟服役。他們連地主給予永久佃農的有限的權利都不得享受。帝國主義就是寺廟及僧徒地主所有權的保護人。增加農民的土地稅而帝國主義又減少寺廟祭壇的土地稅或全部寬免。在英國掠奪者的保護之下，教會土地所有權大大的盛行。在判查布 (Punjab) 地方，土地稅的十分之一是由寺廟及祭壇繳納的。印度南部 (瑪德拉斯及本土各州 Madras and the Native States) 寺廟土地佔廣大的地域。孟買和馬德拉斯的 "Inam land" 也就是奴役農民的方法。英帝國主義者剝奪印度的自由和獨立，同時毀壞了印度的工業和手工業，就這些所得的重要資源從印度農村奪取了許多，而并無一點回報。英國開闢夏的紡織工業，及日本主要的紡織物，很快的淘汰了印度的紡車。外國工廠的出品正在把印度可憐的農民的最後的一把米搶奪走了，但同時又使他們從這貧困生活中無地逃生。在一個落伍的奴隸國家以內，機器及科學技術的利益，僅是為少數剝削印度貧窮人民的

特殊富人所適用。農民以前畜牧牲口的公共場地，已被帝國主義，地主，高利貸者所攫奪。在孟加拉地方，因為黃麻是英國工廠必需之物，所以宜於播種黃麻，但不久被地主強奪了。印度農村只有少數能畜養種地的牲畜。如果農場不及二十至四十畝地大，兩隻牛的飼養，會把所有收穫吃盡。飢餓瀕死的牲畜不能供給病人和小孩的牛奶，所以印度成人的死亡率，比英國增加一倍，小孩死亡數則多過三倍。

農民沒有法子修理他的犁鋤和屋門，或使家人冬日溫暖。森林是歸英國侵略者及地主所有，他們連農民的牲畜在森林內掠過都不准許。

印度的英國統治者正在建築巨大的堰壩及其他人工灌溉的建築，要使印度的土地不停止地為他們的工廠生產原料（棉花黃麻，油子等等）但是水利已經被世界的強者所奪。地主及土地掠奪者都是印度河川泉源的所有者，土地無水會乾枯荒蕪，而這水在印度已逐漸脫離了農民的乾枯的池塘。

然而，對於土地更壞的一點，就是各處農村的土地，都是散布在十處至三十處不同的地方，分成小塊的耕種着。農民徒然竭盡他們的勞力，耗盡他們沒有肥料肥田的土地。有些小塊田地簡直不能下犁。

每塊地的距離太接近，相互纏結，以致田地原為養活農民，今則反變成害農民的陷阱了。農民就是在這些可憐得恨的小塊的而大部又是租來的土地上，他們是必得被地主壓榨。法律規定農民不得地主的允許，不准開掘小的水池。他又不得建造必要的房屋。他尋覓水源，用厚的圍牆把自己從鄰家分開，依照法律，從這邊跑到那邊去尋每一英寸的地產，但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權利。他的收穫的大部分歸地

主和高利貸者所有。他必須繳租，如不賣出所有物，就得放棄他的收穫。正當市場上充滿着農產品，而價格低極的時候，他却得去出賣他的收穫品，因為此時恰恰是地主，高利貸者和稅吏等伸手向農民收穫索款的時候。農民負擔極重而被掠奪着，由此他的剝削者，乃可獲得新的財富。農民負債日深，因為他的田地的任何災荒，不良的收穫，牲畜的死亡，家庭的疾病親屬的死亡，以及他子女的婚嫁都足以引他墮入高利貸者的獵網。他的田地漸被毀滅，不能買農業用具，既無土地又無種子及水的灌溉來執行有利的輪流的播種。通常

的印度農民及其家庭都在飢餓中，大半沒有工作。他生產穀物不能養活自己，他的勞動所得還不够支持他的負債。地主稅吏等掠奪他的勞力所獲的收成，他們簡直是英帝國主義者的奴隸。印度的土地因農民被毀壞，漸成瘠地。日本米的收成比印度約高兩倍，美國麥的收成，較印度高三分之一。印度農村的行政權全在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掌握中，他們是上層階級土地掠奪者的代表以及官吏等所組成的勢力，藉英國軍警武力為護身，來壓迫農民，以致農民羣衆陷入飢餓，無處求到援助和保障。

上篇完

美國豫算制度與 N. R. A.

崔敬伯譯

菲爾德 F. V. Field 主編的『太平洋區域經濟便覽』(Economic Handbook of the Pacific Area) 新近始到中國。本論壇第六期，在『蘇聯財政中的豫算問題』一文中，曾經介紹過。其中珍貴而值得參考的材料，所在多有；太平洋風雲正緊，吾人對於此書，實有不時翻檢的必要。茲復摘譯該書二九八頁以下數段，既以介紹美國之非常預算，兼以促起中國讀書界的注意。

譯者識。

經過了多少次不成功的企圖，打算改革預算，終於在一九二一年，完成了『國家預算與會計法』(National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此次立法，使總統負責，每年提出聯邦政府的完全預算於國會。根據此法，成立『預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在歲計長(Director of the Budget)的支配之下

，直接代表總統，編製預算。此外又有一種規定，總統以預算領袖人員的資格，執行其職務時，其應做的工作，不限制於編製預算，還要對於國會所通過的經費款額，經過預算局，實行嚴格的監督；而且應該以敏捷的手腕，促成政府事業的進步。一九二一年立法之後，同時成立『總會計局』(a

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獨立的審計長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之下，法律賦以特權，可以檢查一切帳目，報告於國會。每當預算編成，送達國會之後，即由國會，成立委員會，負責查之責。此種委員會，可以要求行政官吏，到會說明，使其提出帳目。並可採取他種步驟，助成預算中其他項目的決定。經過這些考慮之後，然後製成『經費分配法案』 (An Appropriation Bill)，提出於立法機關。

一九三二年，美國一位財政學者舒爾茨 J. W. Schultz 在他所著的『美國財政與租稅』 (American Finance and Taxation) 的九十三頁裏邊，曾說過：『美國國會，在實際上曾證實了一種「不幸的傾向」，因為它核准了超過總統在預算中所請求的特別支出』。

舒氏的解釋，以為『國會方面所以有這種態度，總統和財政部，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因為過去十年間，財政部估計將來的收入，較之實際所收到的，總是失之過低；於是國會方面，便以為：對於支出的分配，縱然超過預算的要求，一定要有充分的收入，足以彌補這超過的支出』。

美國的預算改革運動，還是由各州政府開其端，繼引到一九二一年的聯邦立法。截至一九三二年終，所有各州政府的支出，都在這樣的預算程序之下，被監督着。固然在幾個州預算之間，還免不了『權宜處置的性質』 (makeshift character)。但是也有幾州縣，甚至將預算的規定，列入她們的憲法。幾州縣並將管轄以下的地方政府，用立法的手續，課以一致的預算與會計的要求。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其財政的效能之相互的聯繫，漸次看到更大的發展。同時，聯邦稅制，影響於州及地方者如何？州及地方稅制，影響

於聯邦者如何？也都很加以考慮。聯邦政府及州政府的協款制度，與中央所經辦的收稅辦法，其發展的經過，都是很可注意的。

一九二一年的預算法，實行了不到幾年，一位著名的預算作家塞德曼 H. P. Seidemann 對於聯邦預算，曾批評過：『法律所預想的和實際所編製所提出的預算案，聯合了兩種特質：其一表示一般的財政報告 (a general financial report)，又其一，則表示一種財政的工作的進程序 (a financial and work program)；雙方對照，可以很清楚的，表示二者間的互關係。從事實的觀點看來，現在所提出的預算，對於政府的工作，足以表示最清楚的財政報告』。(參看 M. C. Mills and G. W. Starr,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ew York, 1932. p. 776.)

塞氏所說，當然指着那些動超千百的完全預算報告。但是我們看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預算通牒』 (Budget Message) 所顯示的文件，不僅足以窺知美國預算的大致內容，而且世界到處都注意着羅斯福總統，究竟用什麼方法戰勝蕭條？藉此亦可供給一種很好的基礎，分析整個的復興計畫。

據該報告所發表，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美國實際收入為二，〇七九，六九六，七四一·七六元。實際支出為三，八六五，九一五，四五八·八八元。非常支出為一，二七七，〇三八，一六七·七三元。一般支出與非常支出合計為五，一四二，九五三，六二六·六一元。支出總額超過收入總額為三，〇六三，二五六，八八四·八五元。所謂『赤字預算』竟達三十萬萬金元以上。

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的預算估計，收入預計為三，二

五九，九三八，七五六·〇〇元。支出預計為三，五三三，六九一，七六七·〇〇元。非常支出預計為六，三五七，四八六，七〇〇·〇〇元。兩項支出合計為九，八九一，一七八，四六七·〇〇元。支出超過收入為六，六三一，二九九，七一一·〇〇元。所謂『赤字預算』，竟達六十萬萬金元以上。

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估計，收入預計為三，九七四，六六五，四七九·〇〇元。支出預計為三，七六三，二七六，〇〇〇·〇〇元。非常支出預計為七二三，二八六

，五〇〇·〇〇元。兩項支出合計為四，四八六，五六二，五〇〇·〇〇元。支出超過收入為五一一，八九七，〇二一·〇〇元。所謂『赤字預算』，在預計上，雖大減少，猶達五萬萬金元以上。

無論 N. R. A. 的結果如何，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體，是值得注意的。所謂『非常支出』(Emergency Expenditure) 在預算中，既漸增加其重要性；對於這種支出的統制，亦由『預算局』嚴格執行。同時由『總會計局』的審計長，檢查其支出的經過。

顯微鏡下的德國政變

海克爾特著 (Heckert)
邢西譯

關於德國六月三十日的政變，我們在各刊物上雖然已讀到不少材料，但大都未能揭發出牠的秘密。這篇論文從各方面觀察此次政變底前因後果，頗能搔着德國政局底痒處，爰譯出以饜讀者。

譯者

當希特勒在德國攫取了政權時，他自誇說，第三帝國是一萬世不朽的國家。對國內外聲明說，民族革命已使德國人民達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致。自然在第三帝國內還有許多『不舒服的現象』使希特勒無力消滅的。譬如，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力量，即慣會撒謊的希特勒宣傳部亦不得不聲述依然存在着，鬥爭着。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當權的第十七個月——我們在德國經歷到，最高領袖在這一天的夜間把國社黨的一些

大公似猪狗般地屠殺了。六月三十日夜間政府第一次的聲明書說，國社黨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滅了黨內叛逆份子。七月二號政府頒佈了一條法令，聲述六月二十九與三十日的屠殺完全適合於法律範圍，因為是爲了保持秩序與安寧及遏止國內戰爭必須如是作的。一位數月來即已主張『一次革命』的吹呼手——哥貝爾先生——突然吼着，全世界應向希特勒致謝，因為他把『一次革命』底支持者消滅了。能够作這樣美妙的音樂，哥貝爾自然不愧爲第三帝國

的宣傳部長，至少今後還應作下去。

國內外對於此次事變的注視者關於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是毫不視為驚奇的。這種事情終會到來的——這在許多以前已被意識到了。這裏只舉出一件預示着現在事變的最重要的標識：德國國家銀行總理沙賀特 (Schacht) 數星期前曾召集一些大資本家會談德國形勢。在這一會議中他說：『德國已陷於一種無力支付的狀態中。德國經濟已迎向新的危機，現在必須團結一切力量以實行一種健全的安穩的政策。已經不能再忍受哥貝爾所說的那種不負責的謬語了。』兩星期後副總理巴本在馬爾堡大學發表了一篇講演，他說，國內形勢不佳，反對悲觀者不平等者等等的宣傳運動應立即停止，因為牠會引起一切不滿份子底團結。他又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人們狂吼着『二次革命』，在羣衆中散佈着種種不負責的狂妄煽動。這種政策應該結束。如果不即時停止——巴本又恫嚇着說——便應該由一黨制進而爲二黨制，他以分裂及創立新黨來恫嚇國社黨。巴本聲述，德國所需要的不是一種『二次革命』，而是一種保守主義的革命！

槍炮大王提遜 (Tissot) 與克魯伯 (Krupp) 輩更顯然地表現出他們對於崩潰形勢的憂慮，要求有一強有力者能在恫嚇着的革命之前保衛他們。他們認爲高林 (Goering) 是最適當的救星，那麼高林應該特別被重視。

這一期間德國國庫內存儲的現金一天少似一天。沙賀特于六月十五日聲明：『自七月一號起，德國對於道威斯息金以及揚格息金俱皆不能繳付了。』

一如經濟困難，外交政策的困難也在增長着。這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之後已完全顯明了。那麼怎樣辦呢？這一問題又

顯然地出現于政府要人的面前，特別是眞實統治者提遜與西門子等人之前。沙賀特把他的現金又仔細地數了一遍，確定說，在國庫只剩下七千七百萬現金了。怎樣去獲取新的現金呢？商業縮減，借款又辦不到，但是要購買原料以支持各種企業呀。已經購置了許多礦物，銅，鐵，鉛，錫，棉花，橡皮以及煤油等等，但是對於一種長期戰爭依然不敷用。有這麼多的債務，只有七千七百萬現金是不能長期購置原料的。同時還需要現金以預防收成不佳的結果，特別是要預防通貨膨脹底惡險。現在只剩下七千七百萬現金，如何來支持紙馬克使之不至于狂跌呢？通貨膨脹，這是法西斯蒂所最恐懼的地獄魔鬼，因為牠會引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但是，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底災難已可以計日以待了。

哥貝爾又在狂吼着：『這是猶太人的罪惡。全世界的猶太人對於德國已施行抵制。』自然這是胡說。德國資本家賣不出牠們的生產物，因為德國經濟政策的生產費太高。因此被法西斯主義欺騙而失望的羣衆底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了。

在國內已有許多標識指示出，人民對於這些事件已不是漠不相關了。人們對於巨大的事實已不能視若無視。今年一月間的教堂爭執已顯示出小資產階級羣衆底不安。他們不願意聽從哥貝爾所說的：『四年計劃不應這樣迅速地實行，至少需要二十年之久。』這對於農民或小資產階級是有些太長久了。牠們叛離了，牠們向主教表示不滿，聲述不能這樣下去，你把我們領到那兒去啦？主教恐怕喪失了牠在信仰者中的影響，於是開始向希特勒吵鬧。哥貝爾及其同伴向主教恐嚇着說，將以對付共產黨員的手段對付他們。雖然採用了種種對策，仍然不能安穩下去。

緊接着是各工廠中的信託人選舉，國社黨遭受了很重大的失敗。這是一個更嚴重的信號。

外國從這一信託人選舉的事件中即時抽取了結論：國社黨不但未獲取了工人羣衆，甚至他們是敵視國社黨的。就是褐色隊的武裝者在選舉中也未全體一致地投國社黨的票。

一月二十號頒佈了「整理國民勞動律」此律文關於工資契約及其限期的部份特別重要。此條律應於五月一日起實行。後來政府聲明延至六月一日實施。但是六月一日牠又聲明應維持現狀至十一月一日。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許多工廠中法西斯蒂的資本家意欲減低工資，但是在革命情緒的壓力下即國社主義工廠支部（N.S.F.O.）的人們亦不得不起來反對廠方。因此，不但小資本家，甚至於槍炮大王克魯伯亦被威逼着不敢突然實行工資減低與工人底開除。國社黨人已經無力使其所頒佈的條律底要點發生效力。現在我們才懂得，爲甚麼沙賀特聲言「停止社會的煽動」，爲甚麼巴本聲言「停止二次革命」底大言。他們忽然睜開眼睛恐懼地看到的是再不能在舊方式下利用國社黨老爺們以進攻工人羣衆了。但不只在工廠中在失業羣衆中這樣地咆哮着。農村亦開始不滿了。農民已怨聲載道地訴說，希特勒把農民分裂了，有數十萬人固然成了富農，有數百萬人却拋在無地無產的困苦中。但是得到農地的農民們亦是不滿的。農民們如果借債，至少要拿遠多於昔日的利息——一分至一分五，這樣，國社黨給農民加上重息的擔子。整個的農民生產都被嚴格的規定。如同工業中依隨着一切規定進行一樣。農民們被迫着履行規定，但是他們在現在的生產方式下無從實現那些規定。農民們只有以被規定的價格將生產物賣給強制性的合作社，在

那裏却常常不能賣掉。因此只有忍着痛，賠着本暗中出脫他們的生產品。因爲國社黨時時給與農民們痛苦，於是農村也開始怒吼了！

工農大衆以及小資產階級底不滿情緒也波及到衝鋒隊中，這裏面數月以來即已醞釀了。衝鋒隊隊員們不是大資本家，不是地主們，亦不是高級官吏；他們多是生活惡劣的窮苦的小資產階級，曾經相信過，希特勒將作社會革命。他們多是貧苦農民的子弟以及無土地的農民，迫切地要求實施國社黨綱領上所列的一些要求。

在此種情形之下呂姆，漢奈司，哥貝爾，恩斯特之輩戰慄了。如果兩百萬的衝鋒隊員突然吼着：我們要實行「二次革命」，綱領上的要求應該違逆着高等紳士底意志而兌現了！那麼怎麼辦呢。巴本，興登堡以及希特勒周圍的高等紳士們忽然要求給衝鋒隊一個月的假期。但是衝鋒隊員們表示，我們正在進行「二次革命」，爲甚麼要渡假期呢？衝鋒隊中的這種不安亦鼓舞起了其他的階層。「不平者」被哥貝爾的狂談激起來了。從先所不敢談者，現在是公開地談論了。

國防軍內也議論起來了。一直到現在牠們是「守中立的」。將軍們公開地說，把國防軍擴充至三十萬人比衝鋒隊有二百萬人要好的多。衝鋒隊驚訝起來了，這些將軍們要幹甚麼呢？牠們於是宣傳國防軍不可靠。在衝鋒隊中不但反對「高等紳士」，而且也反對高級軍官，因爲牠們也與「高等紳士」一樣壓迫人民，而把衝鋒隊出賣給外國。一種暴風雨吹來了，法國對於德國的壓力，英國的壓力也開始起了作用。恫嚇着的通貨膨脹使小農與小資產階級羣衆有迅速脫離國家社會主義的趨勢。各工廠內的不安與抗爭一天比一天增大。

六月二十五號布命保將軍在頒給國防軍的一道命令中聲述：如果領袖信用國防軍，則國防軍亦信仰領袖。我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很好的了解到這種深意。但是意思是很顯明的，當六月二十八日希特勒與高林去愛森城參與泰萊波汶的婚禮時，克魯伯向他們說，我們到布萊德諾宮去，提遜也在那兒，我們稍為談談。這個「談話會」畢後希特勒與高林急速地乘飛機走了。第二天衝鋒隊底大公們嗚呼哀哉了。只有無頭腦的人會相信，他們在布萊德諾宮只消遣了一盤棋。

六月三十的這種事件近代是未曾有過的，只有中世紀時代才有這種蠻行，但是範圍還不是若是之大。衝鋒隊領袖底被殺以及衝鋒隊之被限制將會發生甚麼影響呢？希特勒當然想着會發生好的影響，克魯伯與提遜之流也會同樣地作如是想。看嗎，現在在德國刊物上我們已經讀到以下的皇皇大文了：「危險如閃電般的被消滅了。領袖又從新把人民統一了，全德國在歡祝他。」

希特勒在政府聲明書中說，衝鋒隊領袖所以被殺，因為牠們有道德墮落與同性愛的惡行。高林對外國記者談話說，因為牠們進行「二次革命」，所以把牠們殺掉。但是道德墮落的惡行從未阻礙過國社黨領袖們，而呂姆與漢奈司等惡漢與希特勒高林同樣地不欲「二次革命」呵。

但是現在每一個衝鋒隊員都知道，衝鋒隊領袖之所以被殺，因為衝鋒隊贊成二次革命而領導者却未強烈反對的原故。希特勒，高林，克魯伯與提遜等人所期待的安穩並未到來。這種壓制衝鋒隊的行動並未解決了任何問題。對於衝鋒隊領袖以及其他人的屠殺只是更加分裂了第三帝國與國社黨。衝鋒隊員們並不因希特勒底聲明而安穩下去。牠們將同樣威

到工農大眾以及小資產階級所感受的壓力而繼續地走入于叛逆行列中。

國社黨用這種政變在國內以及國外都未獲得甚麼。一切國外刊物對於德國所扮演的中世紀的惡行以及德國政府底豎橫手腕表示憤懣。即使向來援助國社黨的英國保守黨底刊物對此事變亦不表示好感，牠驟然地表示不滿，這是英國小布爾喬亞恐怕喪失他們在希特勒德國中的投資的反應。他們會說：「希特勒能驟然以殘忍手段屠殺他的衝鋒隊領袖，他會有一天也同樣地對付我們吧。」

這樣希特勒對外陷入一種更惡劣的狀態中。對於國內他喪失了一件向來依為支柱的最主要的物事：最廣大的羣衆對於第三帝國之鞏固性與永久性的信仰。國家社會主義底不滅性受到一種致命的打擊。或者希特勒從二百萬的褐色隊員中還能找出一些人作為屠殺不滿羣衆的衛兵。但是衝鋒隊已不成為國社黨統治的基礎了，只有向國防軍中去找求新的支柱，這樣，國社黨領袖們便失去了牠們的自由處理權。克魯伯，提遜等輩以及與他們密切聯合的國防軍將軍們底真實統治將會更尖銳更露骨地揭示出來。

希特勒的槍彈不但洞穿了衝鋒隊領袖們的頭顱，不但洞穿了衝鋒隊中不平份子底體軀，而且也洞穿了他親手製成的國社黨綱領！他曾經利用落後的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以及流氓無產階級的羣衆奪取了政權，給了他們許多甜蜜的諾言。但是當這些羣衆真實地要求他履行他的諾言時，他畏懼了。於是奉着德國財閥底指令，依負着國防軍底協助向他的同僚開刀了，向衝鋒隊中的不平份子掃射了。國社黨所恃為靠山的已不是昔日曾被欺騙的小布爾喬亞羣衆，因為牠

們已覺醒了，已被迫地離開國社主義。希特勒所遺留的只有少數的大財閥與國防軍底槍彈。世界輿論已意識到：希特勒

第三帝國底崩潰期更近了，必不可免地要到來，在今年的秋天或冬天！

日本政黨之後退與官僚之前途

張友漁譯

長谷川如是閑著

日本雜誌Economist, 本年九月一日號

日本，自所謂五一五事變後，原來不完全的資產階級的立憲政治，根本上，被收拾起了。一般所謂政黨，像民政黨，政友會等等，事實上，虛有政黨之名，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贅疣罷了。

荒木派軍閥法西斯蒂失敗後，政黨方面，以為有機可乘，所以捲土重來了。不想，新成立了的岡田內閣，却為一種官僚勢力的集團。於是所謂「官僚政治」，遂成了言論界所批評的中心論題。這篇文章，是分析政黨和官僚的消長之社會的原因的，長谷川氏為日本有名的批評家，其立場，是自由主義者而帶有唯物派的傾向，這恐怕是一般人所熟知，而不待介紹的罷？

(一)

從來的習慣是把「國務」，區分為「政務」和「事務」的，但這種區別，實質上，是很曖昧的。和政治的大局沒有關係的事務的職能，不待說，這是有的。但伴着近代的政治之實質的變化，而事務的職能之高級的部分和政治的大局，遂至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結果，持有事務的職能的官僚之高級的部分，和擔當政治的大局之政治家二者之間的根柢上的區別，便成爲很曖昧了。

在政治的大局上，要求某種急激的變化時，因為在社會的構成上，有不知不覺中，已起了強度的進化作用的時候，——例如所謂對於貴族政治而市民的勢力已經抬頭的那種時候——所以適應那種形勢，而為了實現政治形態的改革之大局的運動，是以代表的政治家為中心而被實行的；那種場合，從來的官僚，便完全失掉機能了。但縱然在那種場合，也因為政治家自身，不是組織上的專門家，所以技術的部分，不能不有待於所謂事務的人才之官僚。即在明治維新之際，也當新政府的政治家，漸漸進而從事於建設事業的場合，不

得不起用了舊幕府的官僚，而使參與一切方面的國務的內容。

然而這種場合，所以沒有變成了所謂「官僚政治」之屬僚的政治，是因為隨着大局的推移，那時代已成了以代表各種社會層的政治家底政治的工作為必要的時代了。其後，在從專制政治走向立憲政治的過程上，曾發生了下述的對立，即一方面，還要在一定限度內維持前者的性質，另一方面却要把後者推進到一定的強度；在這場合，一切政治家，都向立憲政治的推移之路途前進着，而在同一路途上，還不免發生保守和進步之二傾向；這原是近代史上底原則的事實。在這種時期，國家的政治，因為還不能夠依靠市民政治之「代表政府」，當然，是要使專制時代的形式，繼續着的。但這個時代，既已不是在專制時代那樣的貴族主義的政治，而不僅是舊封建貴族，隱在了政治的背後，實質上，貴族之政治的分野，已成爲極薄弱的東西，繼之而起，在實質上代表保守勢力的，却是獨占「政治」和「事務」的政治家，即所謂「官僚政治家」。

(二)

這種場合的官僚政治家之發生，是基於「國務」之必然的傾向的；而在這種必然的傾向，有二種事情。第一，是國務被專門化了；第二，是發生了「國務」之獨占。

所謂「國務之專門化」，是在封建末期就已發生了的事情；那便至於國家財政和社會的經濟事情，具有密切的關係，而財政事務成爲政務之中心，從而至於政治的實際勢力，移於具有特殊的經濟知識和財政能力的人們之手中了。即在日

本幕末時代，也然，雖然一切的官職，還是身分的，世襲的，但只有結計員，則定爲了不拘身分依其能力而選任的制度；這就是「國務之專門化」的過程。像二宮尊德，便是爲時代所要求的在這樣形勢之下的專門的企畫者之一人。

在新的政治形態下，這種國務和財務的關係，愈加密接了，這是不待說的，而且縱然在其他國務的方面，下述事實，也成爲必要了；即不是具有專門的技能者之實力，拖着政治家走，便是政治家自身，相當地具有在「政治」以外，技能地，參與國務的內容之能力。近代的英國政治家，曾被認爲比較地通達國務的實際，這也可以說是由於英國的習慣，同一個政府的壽命，是比較地長的。日本自明治十年代起，由於維新的政治家的政治的獨占，使政府方面的政治家，至於關於國務，具有能够相當專門地參與的資格了。伊藤博文之在政府的勢力，山縣有朋之在軍部的勢力等，雖然是憑藉所謂藩閥的或官僚集團(基爾特)的背影，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伴着實際上國家政治之專門化而在其專門的技能上，自達到了相當的水準，同時，獨占着了由一定的機關得到的技能。

這個時期的官僚政治，是一方面，站在貴族主義的支持者之地位，而他方面，完成了在走向立憲政治的過程上之政治的技術者之任務的。客觀地觀察這事則這種意義之初期的官僚，決不是單純的舊政治的防禦線，而在另一方面，却是走向新政治之途的領導者——固然是懦怯的——故這種性質的官僚，不是舊時代的防衛者，也不是新時代的代表者，而是從舊政治走向新政治去的過渡期之政治過程自身的代表者。俾斯馬克，伊藤博文，在這種意義上說來，都不是民主

主義者，也都不是貴族主義者，要之，是他們自身的時代之政治的表現。日本之所謂「藩閥」的意義，在那時代，也已經不是舊封建貴族的勢力，而是具有和其傳統的組織，沒有什麼關涉的集團的構成之官僚的新勢力之組織。因此，縱然「藩閥」怎樣地有勢力，封建的政治的分野，也決不能復活，要之，那是由新官僚組織所產生的集團的形態。

所謂藩閥政治不是純然的貴族政治這一點，並不是就使牠成爲特殊的「官僚政治」的。這種意義的官僚政治的特質，在把牠自身的組織，和新興市民階級，結合在密切的關係上，而欲避免市民自身的政治之到來。這是因爲一方面，市民階級自身，還沒有進到具有在國家政治的大局上的統制組織，而從封建的政治形態的遺骸之政府的組織所產生的官僚——獨占了政務與國務的官僚——遂至支配了前市民政治時代。在這樣的期間，無論在什麼國家，這種官僚，都是成爲政治的技術家而握着政權的。雖然是這樣，他們所以具有要避免市民的代表政治的傾向，是因爲一方面，在客觀情勢上，那個時期，市民階級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具有他們的政治形態的程度；他方面，由國務的獨占而發生了的集團的勢力，具有防止國務的實權之推移的當然的傾向。由於國務的獨占，而產生樞要的地位爲一派一系的人們所繼續着占領的傾向，這一事實，爲官僚政治之主要的特徵之一，但這個不是由政治的必然，所產生的現象，而是縱在怎樣的政治形態之下，也從組織本身的機構，所產生的傾向。不僅在封建的組織之下，是這樣，即在政黨政治之下，同樣的事情，也發生於其政黨的內部，而在民間的大公司，自治團體，寺院，乃至勞動團體那樣的地方，也常不免發生一派或幾派獨占的人

事關係及其他的因緣。集團生活沒有被僅在機能上構成，而爲和機能沒有關涉之個人的或朋黨的系統所支配，這一事實，爲人類社會所具有的一個弱點。這是人的信用僅成立在所謂持有家族，血族的關係，或朋友關係，鄉土關係，出身關係等那樣聯絡的人們間，之古的社會形態的遺留；而縱在怎樣地組織成爲機能中心主義的時代，人的信用，也動輒成爲依據這樣的舊習。故縱然在今日，還存在着的這樣的傾向，把牠叫做基爾特性質的關係，恐怕是最妥當的罷！日本明治時代之像這樣的初期的官僚政治，是由於國務之獨占，使這個基爾特組織，從內部構成了的官僚或專門技能者之政治。

(三)

在次一階段，則官僚政治，當然是採取順應市民階級之政治形態的組織上的變化的。尤其在舊政治的勢力，對於新興勢力，不具有採取頑強的防禦態度之形勢的國家，則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之推移，是比較自然的；和這個同樣，從官僚政治向着代表政治之推移，也寧是平和地被實行的。特別像在日本的場合這樣，被平和地實行了的事情，似乎沒有採取普通的成例。但像前面所曾說到，因爲無論在什麼地方的國家，初期的官僚政治，決不是舊政治之代表的勢力，而是向新政治去的過程之代表者，所以在對於客觀的情勢之認識，沒有錯誤的限度內，從官僚政治向政黨政治之推移，當然是應該自然地，平和地，被實現來了，在貴族或官僚的組織，變成很固定的，對於歷史的推移，變成盲目的，而至於缺乏了使自己順應時代的柔軟性之場合，則這種歷史過程之必然的進行，往往是伴着暴力的發動的。在日本的場合，

因為不論是貴族或官僚，都沒有那樣的固定性，而對於時代之順應力的方面，比較對於傳統的觀念的執着力為強，故事態寧是秩序的。那不待說，是使這些舊勢力改變方向之社會的背景，有相當力量等客觀情勢的結果。如前所述像官僚的勢力那東西，其社會的背景，是新興市民階級的勢力，而不是舊貴族的勢力。即使想到這事情，那也是當然的了。

從那裏，官僚政治家的全部，一躍而轉變為政黨政治家的那事情，也產生了。那是由於官僚本身的背景如何所發生的當然之結果，而不必是他們的個人的聰明之結果。日本的市民的勢力之發達，雖說是由於歐戰所收到的漁人之利，但決不應該沒有比較以上的根柢；在生活上，和在經濟的態度與精神的態度上，有使向近代的社會形態之順應，成為容易的國民的特徵，而成為妨礙這種順應的形態之舊勢力，雖然不完全但漸漸地被清算了；這事情，成了大正時代向新政治之急激的發展。在市民社會的發展，沒有達到這個階段的期間，理想地所企圖的急進的政治運動，在其精神和氣魄上，雖有可驚者在，但沒有能够成功；而當已經達到了這個階段時，當初之個人的精神和氣魄，寧已稀薄了，但政黨政治之成立，却成了事實。由是可知政治是怎樣地不能不和社會的客觀條件相往隨了。

(四)

伴着日本的官僚政治之後退，而帶來了的代表政治，所具有的特徵，那不是像英國的政黨政治那樣，代表着由時代之社會的利害之分裂而發生的政治的分野，却不過是官僚政治的時代以來，所建築起來了的傳統的個人或朋黨的政治分

野，使他的對立形態，繼續下去罷了。

在初期的近代政治，必成為急進派和漸進派，或進步派和保守派之對立，而那是在政黨的形態上，對立着的；日本之自由黨，改進黨，國權黨，等之對立，也是這樣。但是在從官僚政治向政黨政治之推移的過程，這些對立，經過官僚政治家之轉變，而失掉了他的發生的意義了。

日本之初期的官僚，欲順應政黨政治的形態之場合，他們沒有採取原則上，可以當然想到的保守政黨之形態，却一躍而合流於傳統地成立着的進步的政黨。因此，政黨本身，却也捨棄了傳統的立場而利用官僚的既成勢力，以做為接近政治權力的手段了。

這是日本政黨已經失掉了像英國政黨那樣的社會的階級或利害的根柢而變為新的政治的集團基爾特勢力之證明。而那個畢竟是政黨之對立，失掉原始的意義，不表示在社會的分野上之對立，却成為在離開社會而成立了的職業的政治家的分野上之對立。政治本身成了專門的政治業者之職業團。雖然這樣，但因為政黨自身，具有必須以社會的大家的勢力為背景之根本性質，所以較諸官僚的超然政治，成為新興市民社會之政治機關的職能，當然更能發揮。所謂「有勝於無」，便成了變質的日本政黨之存在理由。

然而使這樣的政治形態失却安定的理由，遂發生了。那便是對立主義的政治形態，伴着經濟的自由主義之後退，而失掉了機能的事情。這種統制時代之襲來，使各國代表各集團的利害之政黨的自由競爭停止，而使變化為依據全體利害的調節之統制政治的形態了。在這種場合，可說再沒有像所謂對立政黨的機關那樣無作用的了。政黨常是代表特殊的利

害，而當做爲了主張且實現這些利害的勢力，是有機能的；但當做統制全體的力量，則不是具有何等機械的設備的。一個政黨的調查或計畫，若意味着全體之統制，則不能不丢掉政黨對立的意義。從那裏，是可以發生政黨聯合之政治的，但像這樣，政黨縱然不能成爲爭特殊利害之支配之機關，而立刻成爲擔當國家政治之專門的企圖之機關，還是不行的。政黨在這種職能上，到底不能匹敵組織地，全體地，掌管着國務的實際之官廳的組織。官僚政治，雖然後退，而官廳的組織，特別是在日本，仍是具有傳統的組織與規模而繼續着成爲關於國務之最有力的專門組織的。從而在政治上，從第一線退下去了的官僚，也以國務的專門家之資格，在政黨的更迭政治之下，成了獨占最有力的調查機關或企畫機關之比較有效果的組織了。

那麼，統制機關而無機能的政黨退下去了的場合，繼之而出現到政治的表面上來的，官僚以外，決無更有別的東西的道理。對於初期的官僚政治，這可稱爲後期的官僚政治。後期的官僚政治，不僅是像這樣的統制時代之產物而成立的，並且政黨政治自身便是具有使一種官僚政治發生之必然性的。這恰恰和在封建本期，政治的實權，握於所謂技術家的官吏之手，是同樣的；在常常更迭的政黨政治家，漸次不能順應複雜的國務之專門化之間，官廳的官吏，在通達各部門的國務之點上，並在持有其掌握傳統的組織之事實上的權力之點上，遂至具有牽制君臨頭上的政黨政治家並駕馭這些政治家的實力。

爲使削弱並妨止這種官僚之實權起見，採取常使官廳的上部異動的方法，這是極普通的，這麼一來，則有使特別應

該被尊重爲專門家，技術家的官僚，恰像政黨政治家一樣，化爲一種傀儡之虞而成爲反官僚之專門家化的事情，但這種方法，事實上，被實行；因此漸次使專門家之官僚的實質低下，並使牠漸化爲政治家的典型。而其結果，遂發生所謂陰謀政治的現象而使縱在政黨政治之下，也發生了變態的政局。

但像前面所述，在入了統制時代而政黨後退，官僚前進的場合，像以上所說的官僚之變態，却在政治上，發生了便利。即由於官僚的上部，常被使得轉換而失去了所謂技術家的實質，反之，在政治的局面之諒解上，得到便利的地位；官僚的組織，被給與了活躍於政治的表面之適當的資格。

關於官僚政治及官僚的組織之弊害，是在政治學者之間，既已被討論着的事情，在這裏，沒有反覆申述的必要，但在像現在這樣後期的官僚政治之場合，其根本缺點，是含有機械地妨礙適應現實之社會的客觀條件的政治形態的發展之危險的，因爲政黨是以某種形態對立着的，所以一個政黨對於客觀條件的認識錯誤，常爲別一政黨所矯正；某政黨失敗，則他政黨抬頭；但在官僚中心的政治，則因爲不像代表政治那樣，有所謂對立的批判，責任的交替，而持着有力的統制力，通過了局面，故不是反應國民的意圖，反倒是漠視國民的意圖，成爲原則了。

而在像現在的日本之場合，即在官僚的前進，在其和政黨妥協之下實行着的場合，則現勢力決不是絕對獨自之存在，而是持有對立勢力的，所以說起來，牠也還不過是具有一個政黨的勢力那樣的實體的東西。即在曾爲代表政治的中樞機關之議會的責任上，和政黨政治的責任者，實質上，不能

够有什麼差異。

日本的官僚政治之前進，在其意義上，是相當妥協的性

質的東西，而那大概是日本的客觀情勢，比較地不很惡劣的反應罷！

修改凡爾塞和約與蘇聯的立場

柳真譯

這篇文章是 Moscow News 記者所作，載于該刊第四卷第二十八號。現在正當俄法親善，蘇俄擬加入國聯的時候，一般注意國際情形的人們，想必很願知道這一變化的原因的原因，故特譯載於此。

六月二十八日是一個重大的日子。在二十年前一九一四年的六月二十八日那天，塞爾維亞的國家主義者普麟栖卑 (Princip) 在薩刺爪瓦 (Sarajevo) 城暗殺了奧國皇子斐迪南佛蘭滋皇子夫婦。當時全世界都被這個槍彈所驚駭。他這個槍彈就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人類歷史上空前大流血的世界第一次大戰的信號。直至十五年以前，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那天，這一鬼怪的慘劇所最後表演的所謂『和平條約』才在凡爾塞宮的鏡廳正式簽字。

現在我們站在凡爾塞和約的靈牀上就提那個恰在這個和約訂立的第一天所提出的問題來，喚起我們對這和約十五週年紀念日的注意。那個舊問題就是：『凡爾塞和約真能給予人類以千百萬痛苦男女所伸手渴望的和平嗎？』現在到這個時候，對於這個問題的問答可以說就是一個『否』字。

引起新的領土分配

凡爾塞和約以及隨後簽定的特刺農等條約確定了而且還核准了一部列強的帝國主義同盟(德國及其同盟國)的失敗，而代以另一部分的帝國主義列強。凡爾塞和約不僅引起了歐洲領土的重新分配，而且引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重新分配。戰敗的德國失去牠的領土的一部，她割讓了亞爾薩斯羅林。薩爾區域已經被法國佔領了十五年了，而上西列西亞的重要的一部也送給波蘭了。德國領土被所謂但澤走廊 (Danzig Corridor) 截成兩段。但澤原來是一個大的德國的海口，從此歸了波蘭，使她得與海口聯絡，現在改為自由市與德國完全脫離。此外德國還失去她所有的一切海外殖民地，那些地方已被改為委任統治的領土，分給勝利的各國管轄了。

除領土的喪失以外，德國擔負着一種像賠償形式的絕對不堪負擔的數目奇大的經濟義務，內中包含貨幣和貨物的償付，假若以以前一切重要的賠款與牠來比較，都有遜色。

強迫解除武裝

同時德國和她以前的聯盟被強迫着解除武裝，德國的軍隊減至十萬人，重砲坦克車以及空中實力建設的權利都被剝奪。

廣義的說，這就是協約諸國希望來固結他們的勝利的凡爾塞和約條款的内容。但是凡爾塞和約缺乏的一點就是武力。俄國伊立奇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正當凡爾塞和約簽字的幾天以後，在紅軍會議席上所講的演詞已是世人皆知的。他說：『凡爾塞和約簽定日，將是英美以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失敗的表徵，今日更變為明顯的事實了』。

現在我們已知道這個見解是如何的完全正確了。凡爾塞和約的結局到底真會怎樣？德國領土被割斷，不可能的賠款債付的加重，使國家主義的刺激運動日見增長的伸展。由於苛重的賦稅及賠款債付而產生的國民和經濟敗壞的局勢，已被最反動而又最喜侵略的德國布爾喬亞所利用來鼓動公憤。不僅是反對凡爾塞和約，而且想發動一個復仇的戰爭，尤其想擴大德國領土至超過戰前所有的範圍以外。

受危機的打擊

世界危機打擊德國特別嚴重，不僅因為牠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而且也是因為已被凡爾塞條約給予牠賠款債付以及其他的負擔，已將牠的經濟基礎傷害。

城市和鄉村的勞工階級和小布爾喬亞的生活程度之慘然的低落，連接着國家主義和國社黨方面復仇的侵略狂的鼓動，最後乃使最反動的好戰份子和金融資本的侵略集團的代表

或代理人——希特拉的國社黨握到德國的政權。該黨旗幟上寫着的要求是努力準備戰爭，不僅要恢復凡爾塞條約下已失去的領土，而且還要劫掠新的領土。

凡爾塞條約規定德國解除武裝的條款已被完全抹去。德國正在公開的再行武裝，她的國防軍的力量如果尚未加至三倍，但已增加兩倍。德國之有禁用的坦克車，重砲，和軍用飛機，這並不是秘密的事。她正在從她的衝鋒隊，勞動徵兵 (Labor conscripts) 以及其他行列中，訓練巨萬的武裝後備軍。這些都在以凡爾塞條約束縛德國而似乎應該反對德國再行武裝的各列強，有目共睹之下實行着。列強之看着德國重行武裝而無所動作，就表示凡爾塞條約的一部分已經死亡了。

經濟條款完全失敗

凡爾塞的經濟條款——賠償的條款，在世界經濟危機和德國現今表面上的破產情形之下，正像紙屋一樣完全瓦解。自從一九三一年德國已停付賠款，現在連牠的私人債款的償付也停止了。因此可知凡爾塞條約的經濟部分也算死亡了。

但是這個還不算全部。凡爾塞條約是所謂協約各國對德國同盟國的勝利的表示。協約國中主要角色是由美國，英國，法意等所扮演。這一結合已經證實不穩定，美國就是第一個退出的。美國對德國訂有單獨的條約，凡爾塞條約連美國的簽字都沒有，這是必須記憶的。

利益的衝突，不久在協約團體的內部組織中，開始發生廣大的分裂。列強的新結合漸漸形成了。到現在這些新結合正在完全劃分明白的外線。一方面有一個集團的列強，準備用各種方式來承認德國的重行武裝，而甚願贊助修改凡爾塞

條約的一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要求。這一集團包含德國以外的匈牙利，意大利以及所謂中立各國等，而且已得大不列顛的同情。德國的重行武裝，就在這些國家集團的默允之下和各種英國私立公司的幫助之下進行着。另一方面，又有在法國領導之下的一個集團，絕對的反對修改凡爾塞條約。

嚴重的威嚇

這個條約與反修約羣的新結合集團，成爲和平主張的嚴重的威嚇。有些主張修改凡爾塞條約的固執者，特別是德國，今日正在斥責蘇聯。他們宣言蘇俄已變更牠以前的立場了。以前反對凡爾塞條約，而現今則反對修約，因此變成這個強盜的和平條約的保護人了。

這些非難是無根據的。蘇俄的立場並未變更。牠常常是而且仍然是反對凡爾塞條約。但是，最重要的，尤其在蘇俄，常常是而且仍然要繼續執行一個不倦的趨向和平的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俄國史丹林在蘇俄共黨十七次大會的演講，曾指示出了這一點，當時他說：當多數國家正在進行戰爭騷動的前夕，蘇俄這些年來已很穩定地不屈服地站在和平的立場上，反對戰爭的威嚇，努力保存和平，出面會合那些在某方面還站在保存和平立場的各國，暴露和撕碎那

些正在準備和煽動或挑撥戰爭之國家的假面具。

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李特維諾夫屢次地述說過蘇聯對和平及安全上的奮鬥。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蘇俄駐英大使邁斯基 (I. M. Maiski) 對英國白明罕的全國和平大會的演說，曾經解釋蘇俄所提議在歐洲各區域和世界各國之間，締結互不侵犯及互相幫助反抗侵略國條約的政策之意義。當時這樣宣稱：「這個條約的目的是什麼？回答是僅在保持和平。這些條約意在反對誰？答覆是僅在反對戰爭的危險。蘇維埃政府對於劃分各國爲敵抗的營壘最不感興趣，她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普遍的和平與安寧」。

修改凡爾塞條約的問題，怎樣呈現於蘇聯和平政策之光明的前面呢？這裏必須鄭重的說明，在目前情形之下像那樣的修改條約，僅可利用武裝僅可在戰爭的結局後才有可能。誠然，倘若按照德國的利益來做任何領土的修改，那便是說要將上西來西亞從波蘭和捷克斯拉夫亞手中，或將但澤走廊從波蘭手中，麥曼耳區域 (Memel District) 從立陶宛手中，北西拉司維格 (Northern Schleswig) 從丹麥手中以及亞耳薩斯羅林從法國手中拿出來。也就是說，要將德蘭斐尼亞 (Transylwania) 從羅馬尼亞手中取出，而還給匈牙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全世界任何人能够如此愚蠢的想到，即令在暫時，

像上述那樣的領土變動不經戰爭就能夠作成嗎？

準備新的戰爭

那就是蘇聯雖然始終不變的反對凡爾塞條約，而仍然不贊助現今修約的傾向，和主張修約各國的理由。她很知道人家正在說什麼『正誼公理』和『公正的和平』時，主張修改凡爾塞條約的各國，實際上却正在想到復仇的勝利戰爭，他們又正在想以另一個和平條約來代替凡爾塞和約，而那個新和平條約將更不公正，並且是建築在更無恥的竊佔他國領土的基

礎上的。他們正在因為那樣的一個新的和平條約而積極準備流血更多的新戰爭。

觀察凡爾塞條約十五週年紀念時，我們看到的凡爾塞的悲劇所在。『和平』二字由勝利者所口授的，已經證明為新的矛盾的一個根源，又是準備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出發點。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目前各國國交的情勢之下，凡爾塞條約引起國際的矛盾與衝突的時常發生，而修改條約畢竟會陷於一個新的不幸的戰爭。這種事實便是凡爾塞悲劇所伏之處。

世界論壇啟事

本刊自一卷第十二期起，改由文心書業社總發行。此後凡關於訂閱，代

售，以及交換廣告等事，概請與該社（北平米市大街青年會南首）直接接洽。

蘇聯經濟地理出版預告

平竹傳三著

劉逸樵譯

本書為日本著名書店「科學社」最新之出版物，內容豐富新穎，一掃傳統的敘述方法，採用蘇聯學者處理經濟地理材料之唯物辯證法方法，以蘇聯地理之特質，闡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之必然，附圖多幅，羅列蘇聯各項資源之出處，洵屬不可多得，非但研究地理者，宜人手一編，而關心蘇聯經濟建設者，尤非一讀不可。各大學高中採為地理科之參考書，亦頗相宜。

本書分上下二卷出版，譯語恰當，印刷精美，益以譯者劉君流暢生動之文筆，允稱空前之作。

北平文心書業社謹啓

最近出版新書

高慶賜先生編「初中本國史綱要」一書，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八角。

本書係高先生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最新標準而作，各學校多採用為教本，茲節錄本書編者弁言之一段，頗可瞭然本書特點之一斑：

「教育部新頒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於教法要點內，又有「注意比較與聯絡」一項，謂「人類進化，原是綿續不斷的，即異地之史蹟，亦可互相印證，故教者不但須注意前後之比較與聯絡，並當隨時謀本國史與外國史之比較與溝通……」本書於正文之下，附有備考，其用意亦即在此。除本文之必要注釋外，餘均為與本國史同時或有關之外國重要史實，備為學生之參考，以謀中外歷史之比較與溝通。此外並附中國歷代帝系於本文之上，以備參考」。

北平文心書業社謹啓

世界論壇社 文心書業社 啟事

遷啓者世界論壇社刊行之「世界論壇」自第一卷第十二期起由文心書業社印刷發行嗣後本外埠訂閱諸君請逕向北平東城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接洽是荷 九月十日

朔風書店啟事

世界論壇現已改由北平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發行所有一期至十期本外埠同業批發賬目仍由敝店結算務祈于本月底結清手續是荷 九月十二日

請看北平市唯一之學術化之

教育日報

日出一大張

特約專家編輯週刊七種：

主張正大

劇影藝術

哲學

材料新穎

藝術教育

文學

訂價低廉

社會科學

婦女

自然科學

每月訂價

本埠四角（按八折實收）社址：北平石駟馬
外埠五角（郵費在內） 大街九十八號

電話：西局三一四號

北平文心書業社徵稿啟事

北平爲遼金元明清歷代帝王首都，民國肇興，亦於此設中央政府，雖時移事換，首都南遷，然其在歷史上文化上自不失相當之地位。

一九一八「以還，東北淪亡，舊都近畿，已成邊陲，地方多故，民不聊生，萃趨此邦，以爲樂土，於是人口日增，學校林立，形成此種變態之都市繁榮。

但學校雖多，每苦教材不適於用，蓋通行之各科教本及一般圖書，間或未盡適合地方情形，且多率爾成書，不免譚陋蕪雜之謂。本社有鑒於此，敬請海內聞達，不吝賜教，或詮舊說，或闡新知，若不背乎政府當局頒布之法令，復力求適合人民生活之要求，大著願來，無任感荷！此啓。